

多伦县志
内蒙古文史资料 翁桂健

史料忆述

第一辑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

前 言

内蒙古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和通讯馆员，均系老年知识分子，阅历丰富，学有专长。为进一步贯彻“敬老崇文”的精神，使他们不但“老有所养”，而且“老有所为”，发挥余热，撰写一些史料和文稿，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特编辑出版本丛书，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本丛书以《内蒙古文史丛书》为总名称，延续不变。具体内容暂分：“史料忆述”（包括搜集、整理的历史资料和回忆录）、“论稿选编”（包括史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论文）、文史专著与文史译著等类。

本丛书以我馆成员的著述为主，同时我们本着以文会友的精神，欢迎各界人士惠赐稿件，以资交流、切磋，共同探讨。

本丛书在一九八四年出版时，承蒙翁独健教授大力支持，并为封面题字，嗣后又得到有关方面的热情帮助，深表谢意。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

1986年10月修订

目 录

孙中山先生革命事迹片断.....杨再田 (1)

国民军进驻绥远时期

——纪念五原誓师六十周年

.....刘映元 张静文 (4)

天主教在河套地区.....刘映元 (25)

附录：河套教区传教沿革

.....巴盟地志办 (85)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王友三 (110)

我参加武汉大革命和广州起义的前后

.....陈鸣霄 (116)

北平和谈与联合办事处.....刁可成 (138)

黄埔军校生活片断.....张希孟 (147)

慈禧入宫之前在归绥.....王学愚 (154)

话说隆盛庄.....梁继祖 (159)

一场反苛政反贪官污吏的斗争

——忆绥远省“三·二八”难民大会

.....卜效夏 (185)

后 记..... (190)

孙中山先生革命事迹 片断

杨再田

按：已故馆员杨再田，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是同盟会会员。在世时，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有所忆述。今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特将此文补载于此，以资纪念。

前清宣统年间，我在太原高等训政学堂念书，那时孙中山派张侠夫到各地联络革命同志，跟我们山西许多学校有志革命的青年联系上，我也在那时正式加入同盟会。此后孙中山跟我们同志就经常有信件往来，我也一直追随他做了好多年的革命工作。

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时是在南京。那时孙先生为了早日实现南北的统一，辞去临时大总统，将大总统职让给袁世凯，自己就任全国铁路总办，决心把全国的铁路修通。但是他也估计到袁世凯的阴谋，对袁世凯很不放心，派同盟会的许多同志到北京了解袁世凯的情况，我那时就住在北京西河沿元成店。事情果不出所料，袁世凯就位不久，就派人到处刺杀革命的志士，想做皇帝。

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第二次北上，由广东到上海，由上海又去日本，再由日本乘轮船到天津。我们许多同志都

赶到天津迎接他。码头上人山人海，虽然飘着雪花，但大家都挤得出汗，连气也喘不过来。欢迎的群众，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外，还有工人、农民和商人等阶层的人。

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也一道下了轮船。当时北方的情况还很复杂，随员叫他小心点，提防刺客。孙中山先生拍了一下胸膛说：我心中公道，无人刺我！随即向群众说明来意，要召开国民促进会。原打算住在法国租界内的国民饭店，但法国领事却派来许多警察持枪阻挠孙中山进入法国租界，警察与欢迎群众当场发生冲突。孙中山叹息说：我深知外国人的行为。为了避免跟法国租界当局纠缠不清，孙中山先生吩咐改住日本租界内的张园。

孙中山先生住在张园的时候，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拜访他，随便什么人都能见他。开头，门口还有个警卫人员，有时对来访的人有所阻难，后来孙中山知道了，就给撤掉。从早晨10点钟以后，客人就济济一堂，多半是京津一带有志革命的青年学生，也有从山东、山西、关外等地跑来的青年。客人很多，孙中山先生的态度非常平和，总是很细心地跟每一个人交谈，并记下每个人的姓名和住址，有时往往接待客人到深夜10时左右。

孙中山先生这次北上，是应当时北方军阀张作霖、段祺瑞之请，北上组织全国统一的政府。孙中山先生在张园跟我们同志谈及：在这次北上，胡汉民曾阻挠过我，不让我前来。他问我：段祺瑞是不是你的同志？我说：不是，他是安福党，与我是大仇敌。他又问我：张作霖是不是你的同志？我说：不是，他是土匪出身，不懂得革命。胡汉民说：两个

人都不是你的同志，你这次北上恐怕要遭他们的大害。我把北上的目的告诉了他：北方人民诚笃有为，有我真正的同志，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到北方去，寻访革命的信徒，从事革命的事业。同时蒙古和西北回民，教育不甚普及，我亦想北上提倡教育，启发爱国思想。他同时还跟我们谈到：我北来后，把一切重要政务委交给胡汉民，嘱咐他诚心诚意继承我的工作，继承我的联苏政策，与越飞、鲍罗廷接洽改组党务。总要与苏联走在一条线上，革命才能成功。

孙中山先生在天津住了几个月，于民国十四年阴历正月左右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我们许多同志都从天津跟去。由于辛苦过度，孙中山先生到阳历3月初便得病了，到协和医院医治，经医生营救无效，临危时移回东城铁狮子胡同顾公寓，即口授汪精卫写遗嘱，最初是用广东方言说的，后来经同志们请求改用北方的官话。在口授给苏联的一封信里大意说：最亲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众同志，我们的主义与你们的主义最终要走在同一的道路上，世界上惟有我们两个国家，是革命的国家，希望要合作到底，把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使各国都成为民主的国家。及至口授《总理遗嘱》之时，已经非常吃力，断断续续，口语已经很含糊了。终于于3月12日早晨6时与我们长辞了。

我从青年时起，即反对满清，将辫子剪掉，在大同府坐过三个月牢，遭受灌水等酷刑。辛亥革命时，领导丰镇警军起义，以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搞了好多年的革命活动，经历了不少的危难，我全家十多口人也牺牲殆尽，终未实现我的远大理想。今天，共产党已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这个理想，我实引以为慰。

国民军进驻绥远时期

——纪念“五原誓师”六十周年

刘映元 张静文

在风云多变，硝烟弥漫的中国近代社会里，“国民军”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所居地位举足轻重，动关大局。国民军与蒋（蒋介石）、桂（李宗仁）、晋（阎锡山）奉（张作霖）等各系军阀部队相比，军纪较为严明，政治倾向于进步。

国民军自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成立以后，豫、直、察、绥、甘、陕等省区相继属于它的势力范围。国民军统治绥远仅仅一年零八个月，对兴建地方工业，整顿财政，兴办教育，修建公路，剿匪安民等方面，均有显著建树。

国民军之所以能如此，是与其统帅冯玉祥将军和其他将领的爱国思想分不开的。冯玉祥原籍是安徽巢县竹柯村人，原名基善，字焕章，行伍出身，他的政治倾向在一九二七年六月的郑州和徐州会议以前基本上倾向于革命。冯对军队的思想素质和军事技术教育很重视，他把“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作为治军的政治口号，并在官兵的臂章上绣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字样，以此教育官兵，激励士气。冯玉祥还经常在士兵集会上讲演，他常说：“老百姓为我辈主人翁，应加以敬重……。”他还让官兵实际为民耕

种、植树、掘井、修堤、修路等，密切军民关系。

今年的九月十七日，正是“国民军”五原誓师六十周年。本文着重介绍郑州会议以前，“国民军”在绥远地区的一些史料，供研究地方史者参考。

一、国民军驻绥前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西路奉军第十六师临阵倒戈，造成奉军全线崩溃。张作霖仓皇败退出关，发电宣布“东北自治”，战争暂得平息。直军把奉军逐出山海关外，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开始，到了翌年十月，曹锟贿选为“大总统”后，各派的斗争更为加剧，整个直军陷于四分五裂状态。吴佩孚不满曹派，积极练兵于洛阳另有它谋。冯玉祥、王承斌等直系功臣受到排挤，心怀怨恨，蓄意报复。

十月十九日孙中山先生通电全国，宣言讨直，并电告段祺瑞、张作霖和卢永祥等同时举兵。在奉天（沈阳）举行了三公子（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会议，订立了反直“三角同盟”。段祺瑞于天津策动鲁督和晋督阎锡山等作倒直准备。张作霖于关外秣马厉兵，虎视眈眈，伺机进窥中原，冀雪前耻。孙中山先生派国民党人与冯玉祥联系，把反直军事情势转告于冯。是时冯玉祥将军任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所辖五个旅和两个独立团。五个旅为刘郁芬的第二十一旅（团长为孙良诚，赵席聘），鹿钟麟的第二十二旅（团长为韩复榘、过之纲），张之江的第七混成旅（团长为刘玉山、韩多峰、葛金章），李鸣

钟的第八混成旅（团长为陈毓耀、石友三、张维玺）和宋哲元的第二十五混成旅（团长为门致中、佟麟阁、刘汝明）。两个团为孙连仲的炮兵团和张树声的骑兵团。步骑炮十五个团总共兵力约两万多人。这些旅长、团长中，李鸣钟、陈毓耀为河南人，宋哲元、韩多峰、张维玺为山东人，石友三、门致中为吉林人，过之纲为安徽人，其余均为河北人。冯深知在直军中自己的实力单薄，若轻举妄动，非但难以成功，而且还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便暗中联络胡景翼的陕军和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伺机倒戈。

胡景翼（字笠僧、陕西人）为同盟会会员，“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冯玉祥督陕时与胡关系颇为密切，故胡将“靖国军”改编成陕西暂编第一师。其编制为两个旅两个直属团和四个补充团。第一旅旅长岳维峻（字西峰、陕西人），两个团团长是邓瑜（字宝珊、甘肃人）和蒋世杰（字朗亭、陕西人）。第二旅旅长田玉洁（字润础、陕西人），两个团团长是党延佑（字以行、陕西人）和王秀文（字俊生、山西人）。炮兵团团长由胡景翼兼任。骑兵团团长弓富魁（字海亭，山西人）^①补充团团长李纪才（字乾三，湖北人）、马毓东、李云龙（即李虎臣）、崔峻峰（字式卿、陕西人）。冯调任陆军检阅使率部赴京时，胡则移兵驻扎彰德（安阳）与顺德（邢台）之间。

孙岳（字禹行，河北高阳人，明代督师孙文正公承

① 弓富魁山西崞县原平镇人，经同乡续桐溪（续范亭的叔父）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加入了“哥老会”，故人称“弓老大”。一九一五年与卢占魁合作挑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旗帜，一九一六年，南下参加于右任的“陕西靖国军”与卢分任第六路正副司令。卢占魁护送叶荃回云南后，弓将其留陕部队苏占魁（苏子元）等军官，依附了胡景翼。

宗之后)为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时任北伐军第一军司令。冯玉祥督陕改编胡景翼部为第一师时,孙岳在中间起过作用。孙岳与曹錕有私谊,但对曹吴的行为深恶痛绝。是时孙岳任直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冀南镇守使,徐永昌(山西崞县人)与顾占鳌为团长。冯玉祥首先联络胡、孙两部,秘密结为反直同盟,积极作发动“北京政变”的准备。二次“直奉战争”起,冯、胡、孙共同商定举事的联合行动计划,推荐孙岳出任北京警备副司令以作内应,胡部担任截断吴佩孚归路之任务,冯部则待机班师回击,以解决北京政府。

一九二四年九月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与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淞沪地盘而发动了江浙之战,拉开了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因为卢永祥是皖、粤、奉反直“三角同盟”中皖系的主要军事力量,所以,张作霖便以反对直系进攻浙江为理由,于九月十五日自任总司令,以六个军二十多个旅的兵力分为三路向直军发起攻击。直军方面以吴佩孚为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后方警备总司令,兵分十路急忙应战。

正当直军失利,吴佩孚亲自到山海关指挥部队与奉军激战之时,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暗中与奉张皖段联络,得知直军败势已定,便下了倒直决心。命鹿钟麟部秘密兼程进京,胡景翼的陕军第一师随行,其它各部密切配合。鹿部于十月二十二日午夜抵京,由孙岳的十五混成旅给开了城门,官兵一律佩戴书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色袖章。神不知鬼不觉,没用一枪一弹控制了北京政府。冯、胡、孙于二十四日抵北苑,宣布“国民军”成立。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张之江为副军长,胡景翼任

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刘骥为参谋长，陈金绶为秘书长。据说续桐溪为总参议。国民一军编制如下：

国民军第一军编制表

第一师师长	鹿 钟 麟	
第一旅旅长	韩 复 榘	
第二旅旅长	过 之 纲	
警备第一旅旅长	刘 汝 明	
警备第二旅旅长	门 致 中	以上两旅系由 第二十五旅扩编
第二师师长	刘 郁 芬	
第三旅旅长	孙 良 诚	
第四旅旅长	张 维 玺	
第三师师长	郑 金 声 ①	
第五旅旅长	宋 庆 林	
第六旅旅长	李 西 峰	
第十一师师长	宋 哲 元	
第二十一旅旅长	佟 麟 阁	
第二十二旅旅长	陈 毓 耀	
暂编第五混成旅旅长	刘 玉 山	
中央第七混成旅旅长	葛 金 章	以上两旅归张之江节制，后 改称国民军第一军第五师

① 郑金声与冯玉祥为“二十镇”同僚，一九一二年随张绍曾前来绥远，后升绥远混成旅旅长，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即把绥远混成旅开到北京，编为国民军第三师。

暂编第四混成旅旅长 石 敬 亭

中央第八混成旅旅长 石 友 三 以上两旅归李鸣钟节制，
后改称国民军第一军第六师

卫队旅旅长 冯 治 安

炮兵旅旅长 孙 连 仲

骑兵第一旅旅长 张 之 江 兼任

骑兵第二旅旅长 王 镇 准 ① 以上骑兵两旅，后归张
树声，改称国民军骑兵第一师

察哈尔第一混成旅旅长 魏 福 升

军官教导团团长 段 其 树

机炮团团长 徐 廷 瑗

骑兵教导团团长 王 镇 准 兼任

（上表见《国民军革命史初稿》）。

国民军第二军编制为三个师，一个教导团，四个补充团；
国民军第三军编制为四个师，三个混成旅，一个补充旅，一
个混成支队。

二、李鸣钟出任绥远都统

“北京政变”之后，军阀之间各怀鬼胎，积极备战。一
九二四年十一月冯玉祥通电辞职，藉此电劝吴佩孚同时下
野，以避免战事再起，荼炭人民。吴佩孚野心未死，对冯的
劝告置之不理，企图东山再起。卢永祥谋复旧位，怂恿奉军
南下，张作霖企图用武力逐鹿中原。许多方面则致电冯玉祥
力阻其下野。据《国民军革命史稿》记载：“惟冯毅然远
引，然政府草创伊始，建设需才。况冯为倡导和

① 王镇淮出身“淮军”，后继乔健才为驻防丰镇之察西镇守使。

平“首都革命”之主动者，断难听其高蹈，因是阻其出洋，促令勉任艰巨。而国内外敦劝之电，日必数至。国民党诸同志，尤以大义相责勉。冯义不容辞，乃至张垣，就任政府新任之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以后“国民军”改称为“西北军”。原绥远都统马福祥（字云亭、甘肃导河人）投靠于冯玉祥出任了西北边防会办之职务。其子马鸿逵的中央第五混成旅，改编为“西北军”第七师，后随刘郁芬的部队，由绥远开入甘肃。一九二五年一月马福祥离绥到张家口赴任后，冯玉祥推荐李鸣钟接任了绥远都统。（一九二八年绥远未建省前，其建制为特别行政区，）李鸣钟于一九二五年一月率国民军一师之众到绥，与此同时，“北洋政府”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刘郁芬为甘肃（辖宁夏、青海）督军。一九二六年四月蒋瑞退继李鸣钟之后代理了四个月的都统，到了八月又由宋哲元暂代。

在国民军驻绥的这一阶段，绥远的行政官员，据《绥远通志稿》职官卷记载：“绥远都统署秘书长由唐襄担任，李兴中任参谋长兼军务处处长。政务厅厅长贾德润（安徽合肥人），民国十五年元月郭景岱（河南项城县人）继任之，十五年八月又更换为屠义源（湖北孝感县人）。财政厅厅长为邓哲熙（河北静海县人），十四年十一月为惠俊卿，十五年五月为魏书香（河北景县人），八月为魏宗晋。教育厅厅长为沙明远（山东临清县人），十四年十一月李泰荣（河北阳原县人）继任，十五年七月为郭象汲（本省归绥县人，原学务局局长），同月更换为李庆施（山东滕县人）。实业厅厅长为韩安（安徽巢县人），十五年六月傅焕光（江苏太仓县

人)继任,八月更换为卢铭新(浙江上虞县人)代理。警务处处长门致中(吉林人),十四年六月为李圻(河北广平县人),十五年五月严惟俭(河南淮阳县人),九月为郭风山(山东人),十一月为吉鸿昌(河南商丘县人),警察厅厅长为门致中,十四年六月为李圻,十五年五月为严惟俭,十一月为吉鸿昌。审判处处长孙圻圻(江苏无锡县人),十四年七月为刘国祯(河南沈邱县人),十五年八月为刘绥曾(河北清苑县人)。塞北关监督为朱荣汉(安徽桐城县人),十四年七月为章炳昭(河南郾城县人)。垦务局总办为韩安,十五年六月为周晋熙(四川成都人)。烟酒事务局局长王毓和(江苏淮阴县人),十月为孙寿山(山东历城人),十一月为赵冠臣(辽宁北镇县人)”。

“国民军”进驻绥远正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洪流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军阀残余势力,社会上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氛,“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的歌声此起彼伏。冯玉祥早在直奉战争爆发前就接受了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所以,他与共产党人来往颇为密切,赞成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在军中容纳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李大钊等同志与冯玉祥的接触较为频繁,经常根据时局变化及时向冯提出重要的意见,并由共产党员蒋昕松和胡英初等,于一九二五年在包头创办了“西北民报”,传播革命思想。这对冯部后来的五原誓师响应北伐的行动,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先

后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邓小平、宣侠父、刘志丹、吉鸿昌、刘伯坚等同志，他们对国民军官兵的政治倾向都有过深刻的影响。国民军的成员多为贫苦工农，尤其是冯的嫡系部队更是如此。他们的军纪严明，战斗力强，与民众的关系颇为密切，对共产党人的宣传极易接受。国民军驻防期间，绥远的革命气氛亦很浓厚，在归绥，李鸣钟都统经常在军队和民众集会上宣讲爱国图强的道理，同时都统署的官员和驻军亦开展政治工作，宣传活动深入到工、农、商、学、兵各行业。都统署还成立了通俗教育服务组织，深入到各县局巡回演讲。通俗教育讲演员有：路体元、张杰、费复思、许易祐、吕冀圃、张良弼、王文韶、德善、刘廷广、李映山、杨增、张志仁、孙美、王佐治、曾科、萧恭、贾占全、张希圣、张文亮等，分别在归绥、武川、托克托、和林格尔、萨拉齐、清水河、东胜、固阳、五原九县和包头、大余太、临河三个设治局轮换讲演。

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国民军驻绥期间，绥远地区的革命运动也高涨起来，共产党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当时著名的绥远籍蒙汉共产党员，除乌兰夫、佛鼎、奎壁等到苏联留学外，有李裕智、吉雅泰、多松年、王建功、杨植霖、刘远志（刘进仁）、麟祥、王炳璋、刘兆高、崔文彬、徐德、恒升、白从喜、任殿邦、范建中等人，他们活动于群众之中传播革命种子，号召工农民众团结起来，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五年九月包头石拐沟曾发生过由共产党人李裕智领导的一千多名煤矿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由于有这么一批共产党员的努力，使党在绥境人民群众之中有了很高的威信，许多爱国热血青年投入党

的怀抱。国民军中的爱国官兵亦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国民军在绥远的政绩

绥远地处塞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有水草肥美的牧野，有土地肥沃利于发展农业的河套和土默川平原，有蕴藏丰富的矿产，有分布于西南地区产量众多的盐湖碱滩。但是由于绥远长期处于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资源得不到充分地开发利用，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民国以后，军阀混战，绥境土匪猖獗，农业生产屡遭破坏，商业贸易常受骚扰。面对着绥境百废待举的状态，国民军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整顿，使绥远的面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剿除土匪

绥远地区的人员成份非常复杂，因为河套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稀少，容易谋生，距中枢遥远，所以在明朝时便成了内地罪犯的逋逃薮，许多逃亡人在此躲避官府的缉拿。清代康熙帝统一了内外蒙古之后，口内大批的汉族人民带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涌进河套和土默川平原。到了清末民初，这个地区的许多人被“三套”（“三套”为当地流传的“黄套”即土地，“黑套”即鸦片，“红套”即“破鞋”的合称）套住，不少人意志消沉，最终沦落为好逸恶劳、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流氓无产者，和一些失意军人，溃兵游勇，结伙为匪。除难以数计的三五人成群、七八人结伙的“不浪队，”“独立队”以及“绑架队”之外，能够攻打村镇的大股土匪亦有数十股。在国民军驻绥期间，诸匪之中最大的一股则是杨万